

January 1934

南方對於西化的貢獻

Xujing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陳序經(1934)。南方對於西化的貢獻。《嶺南學報》，3(3)，92-107。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3/iss3/8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第六章

南方對於西化的貢獻

從中外文化溝通後的經濟方面看去，南方自有史以來，就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史記貨殖傳說：「番禺亦一都會也，珠璣犀，瑋瑁，果布之湊。」漢書地理志也說：「番禺近海，多犀象瑋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後漢書賈琮傳也有一段關於南方財富的記載。

「舊交趾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瑋瑁，異鄉美木之屬，莫不出此。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

晉書吳隱之傳說：

「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

同書南蠻傳說：

「初徼外諸國，嘗齎寶物，自海路來貿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壯時，使韓戡領日南太守戡估較太半。」

最顯明的如南齊書王琨傳說：

「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

舊唐書盧鈞傳說：

「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輻輳，舊帥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為南海者，無不捆載而還。」

唐書黃巢傳也說：

「巢陷廣州，右僕射琮于曰：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之益富，而國用屈。」

韓愈在其送鄭尚書序也說：

「嶺南人舶交海中，奇物溢中國，不可勝用。」

至於宋代政府之因南方和外國貿易而所得的利益之多，更是顯明。廣東通志說：宋南渡後，經費困乏，一切倚辦海舶，歲入固不少。據南宋李心傳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王應麟的玉海及文獻通考諸書所載，自皇祐中歲至徽宗崇寧間，五十餘年，此項收入，從五十三萬緡，增至一千萬緡以上。

元世祖定江南後，對於海外諸國之通商互市，極力獎勵，故因此而收入之利益，當然不少。明史食貨志也說：

「太祖洪武初設市舶司於太倉黃渡，尋罷之，設市舶司於寧波泉州廣州，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

可知在這個時代政府已不能忽視海外諸國之來華貿易，而其最大原因，也許是由於利之所在，不能等閒以視。到了永樂時代之遣三寶太監下西洋，其動機雖注於揚威耀武，然其結果有影響於中國人之在西南洋之經濟生活，也是很顯明的。

到了明萬曆年間，歐洲和中國的海道既直接溝通，南方在文化的經濟方面位置，更為重要。此後中西貿易繼續不斷。中國經濟生活的西洋化，也基於此，同時南方之在中國的經濟生活上，也逐漸的生重大的變化。所謂荷蘭東印度公司。英法的東印度公司的種種大企業，藉以為擴充貿易，開拓殖民地的工具，也逐漸的發達起來。

中西航道的直接溝通，既以南方為中心，南方的經濟地位之在中國，越為重要。清初屈大均在其廣東新語裡說：

「吾廣謬以富饒特聞，仕宦者以爲貨府，無官之大小，一捧粵符，靡不權欣過望，長安戚友舉手相慶，以爲卜羣羶境，可以屬糜脂膏，於是爭以母錢貸之，以五當十，而厚責其贏利。」

太平洋客在其所著新廣東一書裡說：

「廣東以財雄聞於天下，中外所公認也。咸同以來，政府若有兵事，賑荒，國債賠款，需大款大餉等項，莫不向廣東而搜括，其數常數倍於各省，歲出達數千萬萬以上，此廣東之財耗於政府者也。而貪官污吏，尤以廣東爲窟穴，其各省無賴之子，人類所不齒者，輒相借貸捐官，以取倍稱之息。分省得廣東則親戚朋友置酒而相賀，到任纔數月，莫不滿載而歸。嗟我廣東人，其飽虎狼之吞噬者，歲不知幾何矣！此廣東之財耗於官吏者也。至於洋貨之進口，以廣東爲大宗，此廣東之財耗於外洋者也。然而統稽一縣之財，往往比他荒瘠之一省而有餘，即比之歐洲小國，亦未見其不足。固由出外洋善經商之故，而其飲食起居器用奢麗之程度，各省常爲驚羨所未見。蓋粵人一月之費，足彼一歲之費者常多，則財力之厚可知，此財力之超于各省者也。」

上面是說明歷來南方在中國中外交通的經濟上的地位的重要。我們若從出口貨的大宗，像絲茶來看，南方也佔最重要的地位。以茶來說，據民國四年到十八年所編的統計表來看，湖南與福建二省的產量已超過全國產量之一半，此外廣西貴州雲南廣東江西各省尙未算在內。至於蠶絲，廣東一省也可以說佔最重要的位置。據今世中國貿易通志所載，全國絲廠不下四百三十家，而廣東已佔二百九十九家，絲車全國有十六萬六千七百五十四部，廣東有了十三萬六千八百六十。

近年來絲茶出口大受打擊，然此種現象，全國皆然，南方和其他

各省同樣的受了影響，故以廣東而比諸各省，其重要的位置，固沒有多大的變更。

若再從各種現代化或西洋化的工商業之規模較大者來看，也多數策源於南方，或是在南方人的指導之下。以新式繅絲而言，光緒初年廣東陳啓源因經商安南，見法人在安南的繅絲工場裡所用的新式繅絲機器，乃創造足踏機，以人力代火力，其後又改用蒸氣原動力，為華人創設新式絲廠之始。棉紗紡織廠的設立，雖發軔於光緒十六年李鴻章所創辦的恆豐紡織新局，然現在最大的棉織業之一，要算廣東人所創辦的永安紗廠，永安紗廠乃永安公司於民國九年將其營業盈餘的一部分來創設，而永安公司又為在澳洲的廣東華僑三十餘年前所創立。

菸業製造公司之較大者，始於香港的南洋煙草公司，和天津的北洋煙草公司。北洋未幾停閉，南洋則慘淡經營，繼續維持。及簡氏兄弟接辦以後，營業遂蒸蒸日上，而為國人設立的最大企業之一。現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營業，雖已衰落，然其在菸業上的位置，却不能忽視。新式酒業之最大者要算煙台張裕釀酒公司，這間公司是開辦於光緒二十一年，而其創設人是廣東潮州的張振勳。張氏乃南洋華僑，因為憤慨中國實業的不發達，屢想有所振作，後來有一次因事被法國領事請讌會，席間飲葡萄酒，因學其葡萄出產處及製造法，並聘請西洋技士贊助，三十多年來，慘淡經營，逐漸改良，不但是在國內成為最大釀酒的公司，就是在遠東也為不可多得的企業。

此外又如糖果罐頭餅乾業上的已經失敗的馬玉山，以及營業正盛的安樂園，泰豐公司，冠生園，通通都是創自粵人之手。裝飾品方面的廣生行，香亞化粧品公司，已為國內不可多得的企業。至於百貨公司如永安先施大新以及已經失敗的真光也通通是粵人所經營。至於航行中外的船公司如中國郵船公司，雖已失敗，然而這是國人之有郵船的第一

聲，而且又是在粵人管理之下，至於行南方及南洋一帶的中國人的輪船公司，無一不爲閩粵人所經營。

上面不過是將私人方面所設立的工商企業來說，至於政府方面所設立者，其所在地雖不少是在中部和北方，然很多也是由南人創辦或管理。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李鴻章在上海所創辦的製炮局，雖可以說是近代我國機器廠之開山，然而江南製造總局的成立是湖南曾國藩和廣東容闈的功勞最大。招商局的計畫，容闈老早擬請政府設立，後來雖非由他手辦，然主其事者大都是南方人。鐵路計畫，容氏也早上書懇請開築，後來湖南的郭嵩燾提倡不遺餘力，而第一次由國人自己計畫建築的京綏鐵路，却是南方的詹天佑。孔天增在寰球中國學生雜誌 The World's Chinese Student Journal, 1907, vol. II, No.1 發表過一篇關於比較著名的中國留學生一文裡，告訴我們當詹氏被命爲計畫及建築京綏鐵路時，國人而特別是外國人，更疑惑其不能成功，然經過不少的努力，終底於成。

又如開礦，丁文江先生在申報最近五十年的五十年來之中國礦業一文裡說：

「開平礦務局，爲近代礦業之嚆矢，……然當日李文忠奏請設局之時，其資本二百二十萬兩，實多廣東人唐廷樞所召集。」

此外張之洞在廣州所籌設的繅絲局，也爲政府設立繅絲局之始。又他所設立的漢陽鐵廠，其機器本是他做兩廣總督時所購買的，預備在粵設立織布局及鐵廠者；後來因他調任兩湖，李瀚章任兩廣，不以辦廠爲然，張氏乃將運粵的機器，轉運湖北而成立漢陽鐵廠，及興辦大冶鐵礦。

至於新式的鑒業，差不多通通都在南方，江西瓷器公司初爲官督商

辦公司，萍鄉盜業公司，醴陵盜業公司，福建的寶華公司，均爲新式的鑒業之稍能差強人意的。

上面所說是注重於國內的，至於國外的閩粵華僑的經濟勢力之大，尤爲厲害。比方在馬來半島，樹膠爲最大宗的出產品，而且能夠左右馬來的其他的經濟情況。十年前有人統計馬來的植膠面積，爲二百萬英畝左右，中國人占了四分之一。至於經營絞膠廠者，可以說完全是在中國人之手。陳嘉庚公司以及好多富有的華僑，均以此業著名。至於採掘錫礦，華僑也佔了一百分之七十幾。其他甘密，咖啡，華僑佔很重要的地位。又如荷屬南洋群島的糖業，暹羅的米業，木料業，安南的米業，胡椒等，華僑均占很重要的位置。總之華僑在南洋的經濟地位，不但是南洋的土人，望塵莫及，就是比之歐美人亦有過之而無不及。

華僑的產業，雖在國外，但是他們的財富之影響於國內，尤其是南方各省，很爲顯明。比方上面已經說過瓊州東北三四縣之在南洋的華僑之每年兌款返國者，據一般普通的調查，已有三四千萬。這數縣的華僑之在南洋的經濟勢力，比之各處的華僑很爲薄弱，然其兌返的款項的數目，已若是之多，則華僑的經濟之影響於南方的經濟，可以想見。

其實南方尤其是廣東的現代化的建設，很多是出自華僑之手。年來國人一談到實業工業無不希望或是依賴於華僑的投資。又如在廣州的東山，台山的模範村等的新式住宅區域的發展之速，均是華僑的經濟勢力之影響於國內的明證。

從中外文化溝通後經濟的方面看去，南方固是新經濟的策源地，而佔了很重要的位置；從中外溝通後的宗教方面看去，南方也是西洋化的宗教的策源地。

據說西洋宗教之傳入中國是始於唐時的景教，但是這次因為陸路的跋涉艱難，以及其他的原因，遂至不久便消滅了。同樣元代天主教之傳入中國，也有相當的影響，但是此次的輸入，也多由陸路，而且元祚未久，天主教也因之而衰，到了中西航道直接溝通以後，天主教之輸入中國，遂能繼長增高，以至於今。

從海道直接而來華傳道者，要算一五五二年的方濟各沙勿畧 (Francis Xavier)。他雖不得志而卒於上川島，然繼他而起的利瑪竇 Ricci 對於宗教及文化的其他方面的輸入上，却佔了很重要的位置。利氏是一五八二年抵澳門，他在那個地方住有兩年之久，很刻苦的學習中國語言，後來移住肇慶，上書廣東當道，請求允准他們以一片安靜地方，以從事於宗教上的修養。他在廣東住了十餘年，然後北上，過南京天津而達京都。至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一)始上表，並獻方物，其表裡說：

「臣本國窳遠，從來貢獻不通；遯聞天朝之聲教文物，竊願霑被餘溉，終身為氓，始為不虛所生。因此辭離本國，航海遠來，時歷三年，路經三萬餘里，始達廣東。語言未通，有同啞啞，因僦居而習語文，淹留於肇慶韶州二府，垂十五年，頗知中國古先聖人之學，於經籍略能記誦而通其指。乃復越嶺由江西至南京，又淹留五年。伏念堂堂天朝，且招徠四夷，遂奮志努力，徑趨闕廷」。

從這段話裏，我們知道他後來能夠得到人主的錄用，是很得力於他在廣東的十餘年(一五七九——一五九五)的預備；所謂預備就是學習言語文字，觀察人士風俗，廣交官僚士大夫，使後來北上時，幫助有人，而達到他數十年來之希望。

利瑪竇之傳天主教，其信徒的增加，雖在他到北京以後，然而他

在廣東時已有不少的信徒，制軍劉節齋也相信天主教，且因之而勸節齋到韶州設立天主教堂。總而言之，他後來對於中國人和西洋人的影響，和他在廣東時的預備工夫都有很密切的關係，艾儒畧的大西利先生行蹟裏說：

「其居端州十載，初時言語文字未達，苦心學習，按圖畫人物，倩人指點，漸曉語言，旁通文字。至於六經史等編，無不盡暢其意義。姑蘇翟太素聞利子名，因訪焉。談論間深相契合，遂願從遊，勸利子服儒服，利子嘗將中國四書譯以西文，寄回本國之人讀之，知中國古書，能識真原不迷於主奴者，皆利子之力也。」

明史外國傳裏說：

「大都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耶穌教。耶穌生於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於歐羅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歷九年，利瑪竇始汎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至二十九年，入京師中官馬堂，以其方物進獻，自稱大西洋人。帝嘉其遠來，假館授餐，給賜優厚，公卿以下，咸與晉接。利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卒於京，賜葬西郊外。自利瑪竇入中國後，其徒來益衆，……其國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利祿，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啓，李之藻輩，首好其說，且爲潤色其文詞，故其驟興。時著聲中土者，更有龍華民、畢方濟、艾如畧、鄧玉函諸人。

這些天主教士之初來中國，不但以廣東爲進入的首衝地，而且亦以廣東爲退身地。我們知道自天主教傳入中國後，有了好幾次因爲政

府方面的排斥禁止，致不能在內地傳教。然廣東始終都有教士和洋人的踪跡。其實廣東是他們進退的大本營和根據地，怪不得嘉慶十年五月的諭示說道：

「西洋教蔓延數省，皆由廣東地方官未能稽察防範所致。」

上面是說天主教之輸入中國，是由於南方，而且中國之西洋宗教化，也是策源於南方。現在再來談談天主教徒批評中國的傳統思想。

利瑪竇之初來中國，因見得中國人排外的厲害，故不得不設法遷就中國的習風遺教，而於傳統的儒教，尤多外表遷就，藉以博中國人信仰，而一般人士亦以為利氏乃孔孟之徒，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蹟裡說：

「汝南李公素以道學稱，崇奉釋氏，多有從之者。一日與諸公論道多揚釋氏，抑孔孟。時劉公斗墟在座，瞿然曰：吾子素學孔孟也，今以佞佛，故駕孔孟之上，何也？不如大西利子奉天主教，航海東來，其言多與孔孟合。」

李之藻在天主實義重刻序裡也說：

「彼其梯航琛贄，自古不與中國相通，初不聞有所謂義文周孔之教，故其為說，亦初不襲吾濂洛關閩之解，而特於小心照事大旨，乃與經傳所紀，如券斯合。……信哉，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語文字之際。而是編者出，則同文雅化，又已為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贊教厲俗，不為偶然，亦豈徒然；固不當與諸子百家，同類而視矣。」

然事實上他對於中國整個思想，根本加以否認，且看他在天主實義裏說：

「西士曰：二氏（老氏與釋氏）之謂，曰無曰空，於天主理大相刺謬，其不可崇尚明矣。」

這是很明白對反對中國人所信仰的老佛，其於儒家，他在引言裏說：

「聖人不出，醜類胥煽，誠實之理，幾於銷滅矣。竇也從幼出鄉，廣游天下，視此厲毒，無隙不及；意中國堯舜之氓，周公仲尼之徒，大理天學，必不能移而染焉，而亦間有不免者，竊欲爲之一證。」

這明明白白指出著書的旨趣，是在於證明堯舜周孔之道的缺點，正像他說「中國雖大邦，諒有智亦不免有愚焉」，而其態度最顯明者，像：

「夫儒家之謂，曰有曰誠，雖未盡聞其釋，固庶幾乎。」

儒家固然是有了多少與舊教相暗合，然所謂「未盡聞其釋，固庶幾乎，」是坦白的表示儒教不及天主教。總而言之，利氏雖因處於儒教勢力之下，而不得不曲就其意，然根本上已不承認孔教爲至尊，而視爲次要的地位。所以從手段或事實方面來說，天主教徒固有衣儒服拜祖先者，然從其目的或理論方面來看，他所欲以施行者乃是真正的天主教，而非儒教。

我們以爲：理論上，天主教和儒教有根本的不同。比方上帝創造天地萬物的信仰，已和中國的傳統思想背馳；而否認崇拜祖先，否認君主至尊，和所謂「人知事其父母，而不知天主之爲大父母也，人知國家有正統，而不知天主統之爲大正統」，不但是會打倒以家庭爲中心的思想，還且反對君主稱爲天子的信條。後來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四）羅馬教皇的使者之排斥康熙之對於神學的意見，而致被捕幽禁，完全可以說是中國儒教和西洋天主教的分裂。從此以後，百數十年間，排教禁令，終未撤回，也因於此。

自利瑪竇來中國以後，至康熙捕禁羅馬教皇的使者的一百二十餘

年間，西洋的天主教徒，既未敢，也許是未願意，明目張膽的給與中國人以純粹的天主教的道理和儀式，而假託庇護於儒教之下，所以中國始終未能說是得到真正的天主教；而在禁止宣傳西教的時期裡，天主教雖未因之而消滅，然也難於發展。所以嚴格來來說，從利瑪竇來華以後的二百餘年的天主教的真正大本營，還可以說是在南方。其原因是澳門在這個時期裡，始終是東方的歐洲的縮影，在中國內地固可以沒有純粹的天主教，也許可以沒有天主教，然澳門却是他們的出發的起點，而也是他們的退守的終點。何況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廣東內地始終都有西洋人和西洋教士的踪跡。

所以天主教士雖然假託庇護於儒教之下，然他們對於中國文化的批評和蔑視，是處處可以找出來的。比方利瑪竇在其所譯的幾何原本序裡說：

「夫儒者之學，亟致其知，致其知當由明達物理耳。物理渺隱，人才頑昏，不因既明，累推其未明，吾知奚至哉。吾西國歐，國雖褊小，而其庠序所業，格物窮理之法，視諸列邦為獨備焉，故審究物理之書，極繁富也。」

西洋的槍礮機器，優於中國，就是這時候的中國人已有很多的相信。在禮教上，這些教士既覺得天主教比較儒教為勝，現在他們又以格物明理之法，西洋優勝於中國，然則中國還有什麼是值得他們的贊賞呢？

天主教固是由南方輸入，而且最先浸染南方人；新教也是這樣。是壹八〇四年，馬禮遜上書倫敦佈道會，求請派他來中國傳道。他未來之先，已明白在中國傳道的艱難，然而他却不因此而退却。關於馬禮遜來中國後所受的困難，麥沾因牧師曾說：

「他（馬禮遜）於一八〇七年九月七日抵廣州，他來的時候，那

些英國船舶，都不願載他，因恐介紹傳道者華來，將於他們的商業上，發生阻礙。於是他不得不到紐約去，搭乘美國輪船。當時中國政府嚴禁基督教之傳入，他既爲他本國人所棄，又爲中國人所反對與懷疑，更爲澳門的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所窘迫，但他仍堅信他是上帝遣來傳道的人。他在紐約的時候，有一個船主以譏諷之言問他道：馬禮遜先生，你真以爲你能感動那些拜偶像的中國人麼？他回答道：不，先生，我以爲上帝能夠感動他們。他抱了這種信仰，而開始他工作。」（梁發傳）

我們可以明白這些傳教的先鋒在當時所歷的苦境，同時這些傳教的先鋒的目的，未必和那班以財利爲正鵠的商人相合。馬禮遜和好多的先鋒一生的重要工作，都是在廣東。學習言語，翻譯聖經，宣傳宗教，通通都以廣東來做他們的大本營。

因爲他們的工作是在南方，所以中國的最先信仰新教的人，也是南方人。據馬禮遜傳（Townsend 編）裡說：最先信新教的中國人，是蔡亞高。亞高因爲幫助其兄蔡盧興雕印新約的工作，和馬禮遜認識，此後常相過從，且於一八一四年，在澳門受洗禮。

然而中國新教徒之受洗禮較早而影響於後來較大者，要算梁亞發。梁發於一七八九年生於廣東高明縣。馬禮遜大過梁發七歲。梁發之認識馬禮遜也是由雕印聖經而來。這時梁發已經二十一歲，他追隨馬禮遜和米憐好多年，到了一八一六年始行洗禮。從此以後，他極力宣傳新教，他最先感化他的妻子，其後又感化了他人。除了這些實際工作外，他又寫了好幾本佈道的書，其最先一本，是叫做救世錄撮要畧解。

梁發是近代所視爲一個模範的基督教徒，可是在梁發的時代，做基督教徒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政府的禁令，社會的非難，家庭的反對，以及好多的困苦，都是信教和傳教的人所必受的。意志薄弱的

人，固不待說，就是意志堅強的人，受了傳統思想，禮教習慣的重重束縛，也會弄到心灰志冷的地位。惟有梁發是向前直進，不折不回，備嘗苦辛，歷盡艱難。我們知道他曾反對崇拜祖宗，而在將要舉行婚禮的時候，逃到香港去。他曾因為信仰基督教，受鄉人的反對，而移居廣州對面的河南。他曾因為宣傳教理，而被禁囹圄。下面所抄一封書，就他因為被通緝而逃跑時的個性及工作自白的例子。

「書達一切信愛耶穌之人，願彼等皆得快樂與幸福之生活。我因得救主耶穌之幫助，曾多年繼續堅持從事宣傳福音之工作，且將福音真理提示國人，教彼等將彼等之偶像丟棄，而服事惟一真主宰，創造天地萬物之神。救主大施恩典，賜聖靈以感動人心，因而信道者前後共有十人以上。此十餘人，皆已受洗禮而信耶穌，可救免彼等之罪惡。且彼此一心服事上帝，凡事皆按福音真理而行。三四年以來，我在廣州城附近鄉村，及其他各地，派送聖經日課，人人皆歡喜接受，拒絕不受者，人數却少也。今年（一八三四）適為三年一次之鄉試，各鄉秀才皆齊集省城應試。於是我想從速將佈道小書派送於彼等。因此八月十日，我約同吳亞清（以下之名皆譯音）周亞生及梁亞新，將書籍攜往派送，是日共派出聖經日課千份。（共五千本）而所有士子皆歡喜接受，並無任何滋擾，我儕皆甚為快慰。翌日，又同樣派送一千份，亦並無事情發生。到第三日，當我儕派完數百份之時，有巡卒前來將吳亞清及書籍一份拿去，將吳亞清押至南海縣知事之前。該知事將書籍閱過之後，隨囑巡卒等以後不必干涉此等閒事，因此巡卒遂停止干涉彼等，而吳亞清即被釋回矣。第四日我見知縣已表示不干涉派送聖經日課及小書之事，遂繼續進行我等之工作。誰知我等派完了數百之後，

突有數人帶領巡卒數名，前來將我及聖經十份抓去，我幸而半途從彼等之掌握中脫逃回家。翌日——八月廿五日，我聞巡邏官曾將此書及此事呈報廣州知府，我猜彼或將令差役前來拘捕我等。遂將所餘之書籍放入箱內，並將其運往他處。翌日我離省回鄉，三十一日廣州知府差人至我省城之寓所，將周亞生及其同伴捕至彼面前審訊。當審問繼綸（按即亞生之同伴）時，彼答並不知關於書籍之事，知府命人將彼拿出去打四十板嘴巴，此四十板嘴巴打得厲害異常，致使繼綸不能說話。周亞生於被審之時，將一切事情供出，第二日知府遂派出多人來緝捕我。但捕我不着，九月二日，由周亞生帶彼等重來將印刷人吳英泰捕去，四日周亞生又帶彼等到鄰村中捕去別一印刷人亞集，同時又搜去聖經日課四百本，木板一大束。六日彼等又捕雕板人亞清，八日我聽見以上所發生之事，遂立刻帶我之妻女，逃至江門。翌日知府果然遣一百人分乘二船，到我鄉裡，欲將我全家男女捕去，到鄉後不見我等，遂把我三個親屬拿去，而將我家中什物搶掠一空。且用封條將我之屋門封住。彼等盡將我親屬所養之家畜捕去宰食，且繼續向鄉村各處搜捕我等，但終無法搜獲。至十六日，彼等始回省，回省後將我之親屬黃興愛一人捕去。我有一個親屬，他秘密前來將以上經過情形告訴我，我就立刻帶我的妻女逃往赤坎。最後我身邊所有之銀錢告罄，致不能在他鄉生活，然又不敢逃回廣州，恐自投羅網。於是我就遣我妻潛往省城，將此事告知裨治文先生，求彼助以資斧，使我可以買糧食，而在必要之時，可以逃往別處。誰知彼已往澳門，於是我妻遂不得已空手而回。我帶我之家人再回江門，此時我自己身上，不名一文，而又借貸無門，遂懇切祈求上帝

施恩幫助保護我，往澳門一見裨治文先生。感謝上帝之仁慈，我果安抵澳門，當我見治文牧師之時，我之心悲痛異常，竟忍不住大哭起來。裨治文牧師見我如此悲苦，遂勸我不必傷心，說亞昂與馬禮遜先生之長公子，已託人向知府詢問，謂祇要納贖金八百元，便可釋放在押諸人出獄，而對我及我家人之緝捕文書，亦可取消，不再追究矣。我聞此消息後悲痛稍殺，但裨牧師言，此事尚未完全商妥，須待省城再有來信時，始知真相。彼授我銀二十四元，囑我將此款給我之家人，而我自己立刻再回澳門，我向彼道謝後即起程回家。當告我妻以此事已辦妥之時，伊仍半信半疑，不以我所說之言為確，我將此銀交與伊，是日即返澳門。在裨治文家中等候十日之後，便接得馬儒翰來函說：經磋商多次，最後決定祇要納款八百金，在押之人，便可完全釋放。但巡撫却一定要將我逮捕云。裨治文知此事後，立即帶我及我子進德到一隻快船上，着水手將我僑送至伶仃島船主巴利之船中。巴利聽見我僑所遇之災禍，甚願將我僑藏匿於彼之船中。此種情形使我想起凡屬宣傳上帝及救主之福音之人，一定要忍受迫害，於是我默想羅馬人書八章三十一至三十九節，雅各書五章十一節，彼得前書五章十節之意義，我雖不能如救主耶穌保羅及約伯之堅忍不拔，但我仍願模仿古代之聖者，永保我心之安寧。又我雖曾忍受許多迫害，但我心仍覺安樂與快慰。我現在惟一之恐懼是怕中國政府將我之妻女加害而已，所以我每晨每夕皆求上帝垂憐保護及拯救彼等，同時我亦求一切牧者先生，與所有熱心愛主之人，為彼等祈禱。」

我們不憚煩的把這段話抄下來，因為梁發不但是以一位沒有受過教育的人而能刻苦自讀著書傳教，而且他能獨立不倚，堅忍不拔，不

爲窮苦而灰心，不爲患難而退志。這一種的個性，這一種的人格，在過去的中國歷史上固不容易找出來，即在他死以後至現在的教徒中，也不容易找出來。